

经济科学和资本主义的道德 伊斯雷尔·柯兹纳

简介

我们要在本文探讨一个悠久的主题：经济科学（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对经济科学有缺陷但却普遍的理解）至少要为一个悲剧性的错误观点负上部分责任，而这一观点是：一个成功的自由市场社会必然是一个不道德的社会。此观点已经广泛流传，难以被人驳斥；在某些知识领域，这一观点的广泛性要为二十世纪灾难性的公共政策负责，这无可置疑的。这里所讨论的观点是，这种错误的看法可以追溯到，至少部分地，对经济科学不够恰当的理解。对经济学基础更谨慎的理解能够为更准确（更受欢迎）的资本主义道德形象作出贡献。

经济科学的道德曲解

纵观其历史，经济科学解释了自由市场在增加国家的财富、促进社会有偿的劳动力交换和分工、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协调中取得的成就。事实上，经济科学的这些标准教义，使其被资本主义的朋友和敌人认为是资本主义在任何状态下的理论基础。在一个半多的世纪里，资本主义的敌人认为，如果资本主义要在思想市场中受到质疑，标准经济理论是必须除之而后快的仇敌。而资本主义的朋友，已经认识到严谨的经济学在激发理解和欣赏经济自由所赋予的公共福利中的积极作用。

然而，很多时候，经济科学所呈现的方式是，认为这些收益全然源自个体行为的规范，而最具道德感的观察者们指责这些规范是不道德的。当然，问题依旧是老问题，又是公认的。这至少可以追溯到曼德维尔，他主张，“我们所说的这个世界的罪恶...是[人类]主要的本性，它让我们成为群居动物以及成为所有交易和就业的坚实基础、状态和支撑...”这导致了经济学早期受到的来自道德主义者的谴责，如罗斯金（他声称，古典经济学家和那些能够阅读并接受其作品的人，进入了一个“完全该受诅咒的精神状态”）。经济学似乎可以解释，基于自私又物质的个体们作出的决定之间不受约束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自由市场社会的成功。在大众的眼里，经济学还未能摆脱其对**经济人**的依赖（按照市场社会的效率和富裕的争论），在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的描述中，经济人被定义为“自私的、无情的、道德谴责的对象”。

可以肯定的是，自从1932年罗宾斯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来，几乎所有学派的现代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经济理论并不需要自私和功利的主体，只需要“理性”的主体，即始终利己（与被视为可能的个人“利益”的利他动机一起）。但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外行们可能因为持不同观点而找到借口。经济行为的准则比为实现各种目的而进行的稀缺资源配置的准则更多限制，尽管这一观点说得好听，但是经济学家似乎不断考察一些更为狭隘的关注点。尽管，70多年前弗兰克·奈特坚持认为“必须摒弃对经济需求和其他需求加以区分的观念”，但是经济学家们（包括他自己一些最杰出的弟子）不断把用金钱作为衡量标准的整体“财富”或“价值”的最大化当作经济成功，就像为了社会的某一特定“经济”目标的概念已经被明确定义。

为了享受资本主义带来的益处，人们认为我们必须容忍不道德

因此，在曼德维尔之后的近三百年里，公众有关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教旨的看法仍陷于悖论之中。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的繁荣源自该制度向贪婪的、嗜财的、虚伪的人予以弄虚作假和剥削成性的自由。即使在过去的十年中，舆论始终是朝着对自由市场更利的方向而摇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已经出现了对资本主义德性更为友善的观点。事实是，一个广受认同的悲观看法已经成

形，其大意是毫无限制的经济自由的不道德被视为是西方资本主义奢侈享受值得付出的代价。此等看法过于虚幻，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市场的敌人无论基于什么原因，为了充分学习这个明显的教训，只能等待繁荣发展中出现的磕磕碰碰。这一教训是，经济不道德终究不是有益的。西方经济学的悖论，即经济不道德保证了经济繁荣，将会被成功地戳穿。

看不见的手基于不道德之人的行为不是事实

因此，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个原因，坚持从经济学中驱除这些的倾向，以将市场取得的成功看作是不道德行为的与之相矛盾的良性结果，这是值得的。我们必须坚持以下的指称是一回事：如同有一只无形的手，引领着那些为自身目标严格行事的个人将自己与他人作出的决定相协调。而影射下面又是另外一回事（而且相当荒谬）：这个无形之手正是从市场参与者的道德失败中实现其诡计的。我们必须坚持，自由市场同等的特性是与由无私的利他的市场参与者组成的社会充分相关的，就像与自私和功利的参与者一样。

假想的圣徒和自由市场

为了使这一见解发生成效，是值得去非常简单地概述一下自由市场是如何在一个由高尚的个人组成的虚构社会中运作的；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每个消费者主要的关注是帮助别人，参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消费活动（诸如吃饭、购买新衣，等等）只是为了能够实现其主要的博爱的目标。有时，人们，甚至包括应该了解得更深入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无私地想要帮助别人，那么价格体系必然崩溃。即使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可以应用到一个无私的社会（简单地通过承认帮助他人的愿望必须被纳入到效用理论中），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们认为，由于缺乏利润动机，价格体系必然被打破。在一个充满无私圣人的社会中，乍一看，似乎没有办法将利润最大化的动机纳入其中，而这一动机可能推动价格体系朝着经济理论设想的方式发展。当然，对于将他人的福利置于其自身物质消费之前的个人，他们不会在经营中向其客户收取他们可以获得的最高价格，也不会向工人支付他们能成功摆脱的最低工资。并且，在这一个由圣人组成的社会中，如果抛弃利润最大化的方针，那么这样看来就无法再支持价格理论的结论。在企业理论中，作为利润最大化行为假设的结果，所有精彩论证的边际等式必须被抛弃。在这种纯粹利他的社会中，似乎没有一种效率属性可归因于一个运转良好的价格体系。所以，这一论点可能得到传播。

而这个论点显然是十分错误的。理解这一论点传达出的错误，对澄清在没有圣人的资本主义真实世界中的商业企业的本质和功能，将是有启发性的。

没有圣人的资本主义

事实是，在一个纯粹高尚的社会中，追求利润最大化、收取最高的可能价格和支付最低的可能工资的商业机构，会以与在我们社会中同样的模式出现。在高尚的世界里，商业活动中获得的利润将无疑地被用于崇高的、圣洁的、慈善的目的，而不是被用于成功的企业家们进行的非常自私的物质享受。但是仅此而已。在从事经营中，一个只对消除肆虐人类疾病的恐惧感兴趣的企业家，会严格地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行事。假定，他的至高（事实是他真正的）目标是对抗疾病。所有其他目的（包括提高其工人的福利，或者其企业客户的福利，更不要说其自身的物质福利）必然而且也将服从于为与疾病抗争而去获取最大利润量的整体目标。而企业理论所论证的结果没有变化。

当然，关键是利润最大化只是一个工具性目标。圣徒和罪人都可能寻求利润最大化；他们的区别仅在于取得利润之后的使用。（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圣人和罪人都由高速公路上从 A 城驶到 B

城，使用相同的路线图，并遵循同样的驾驶规则；他们唯一不同是，各自对 B 城功能的不同享受）。利润动机和由此驱动产生的价格体系并不依赖于自私或功利目标的存在，而是在于人类**坚定意志**的存在。在分工和企业家可以自由进入市场的社会中，那些企图获得资源以对抗疾病或实现其他崇高的目标，拥有所有可能让企业追求金钱利润最大化的激励。

我们强调这个简单观点的目的是为了提供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的本质和作用的线索。毕竟，大多数评论家们将最尖锐的嘲笑泼向的正是利润最大化的朴素目标。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被视为绝情、无情和自私，同时狡猾地剥削他人且习惯性地不诚实。认为市场社会有赖于系统性的不道德行为并以此为驱动力，是因为企业家的活动被理解为是自由市场运作的核心。但事实是，利润不是最终目标；只有消费目标才是。利润是工具目标被用于实现直接（消费）目标。追求利润的道德性或不道德性完全取决于追求这些消费目标的道德性或不道德性。

此外，就像菲利普·威克斯蒂德（Philip Wicksteed）85 年前所指出的，商业活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不是**依赖于自私而依赖于“非利他主义”。即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是意味着商人不能认可任何比其自身享受更崇高的目标，而是意味着当时他有某些比提高交易对象的福利更重要的目标，而他打算将获取的利润用于这些目标。我们可以强调说（可能对威克斯蒂德的立场有所修正），我们没有断言，纯粹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不考虑其员工和客户的福利，我们断定的是，按照企业家的效用尺度，上述考虑比起追逐利润的真正目的要靠后。应当进一步指出，为了理论上的目的，研究纯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是方便的，但是，经济学家们已经并且一直清楚地知道，现实世界的企业家们可以通过将“消费”目的（比如那些直接为了员工和客户福利的目的）引入其“商业”活动而随意地变更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具目的。虽然价格体系确实有赖于纯粹的利润最大化的概念，但是现实世界中价格体系社会化的良性属性却不只依赖于该世界中那些分析性的抽象主体的存在，即理论体系中的那些人。在商人将他们的某些消费目的直接引入营利活动的世界里，不难将价格理论应用其中；在商人确实迫切地和真心地照顾到其员工和客户福利的世界中，社会协调同样可以通过自由市场实现。

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是道德中立的

基于明显的事实，所以没有必要详细说明，对资本主义的成功有赖于不道德的行为的否定，根本不是为了维护以下观点，即不道德的行为被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排除在外。指出由圣徒组成的自由市场社会的经济学不会与现实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学有本质的区别，这不是为了将资本家打扮成圣人。重要的事实是，至少在一个最显著的意义上，资本主义是一个道德中立的制度，也就是说，它有效地促进了各类道德目标的实现。当然，在现代经济史上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不总是充满压倒性的无私、高尚或者以其他特别具有德性的商人。而且，确实有可能的是，社会学或心理学理论将人类行为的道德性与人类置身其中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任何其他经济制度）联系起来（当然，当然在这方面，有大量的相互冲突的论文献）。我们的论断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繁荣的经济学 – 显然是该制度最令人注意的特点 – 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由参与者拥护的某些道德准则。

即使企业家道德败坏，产权保护福利

然而，在以下意义上，就不道德的个人行为，将资本主义的成功与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的影响联系起来，可能是重要的。尽管资本主义肯定与非常自私或者其他不道德的行为不相冲突，但是资本主义产权框架是为了消除社会危害，人们可能会倾向于将上述社会危害归因于此类令人反感的行。一套被严格执行和保护的产权必然意味着，尽管一个人的行为可能多么令人厌恶，但是在任何实际意义上，这样的行为没有侵害他人的任何威力。没有产权，那么该经济体中行动者的自

私贪婪必然会剥夺其他人对由该行动者掠夺的稀缺的社会资源的潜在使用。产权安全地置于适当的位置时，贪婪可能滋生需求，它可能要为不慷慨的行为负责；但是，在真正减少他人福利的任何危险方面，我们必须宣告它是相当无害的。在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得到尊重和维护之处，A 的不道德行为是无法侵犯 B 的产权。正如这一章前面所强调的，自由市场不仅不依赖于作为其驱动力的不道德的行为，而且，自由市场制度将其参与者从任何由不道德行为造成的直接伤害隔离开来，无论如何定义。

为什么将贪婪与自由市场联系起来是错误的：摘要

资本主义繁荣的发生只是因为自由市场鼓励令人反感的自私行为和对令人不齿的物质目标的追求，对此广泛流传的悲观看法，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一下回应了。我们可以按照以下论断的形式总结我们的回应：

1. 自由市场在满足需求和协调有目标的计划方面取得的成功，取决于市场参与者所追求的一系列必然不道德（甚至是功利的）消费目标，这不是事实。
2. 此类自由市场的成功取决于企业家们不道德的行为，这不是事实。
3. 虽然自由市场制度与其参与者的各种不道德的行为肯定（中性地）相容，但是该制度的规则保护每个参与者，免于通过他人不道德的行为对其本人实施的直接危害。

尽管我们明确反对曼德维尔的核心观点，即公共利益的发生来自私人的恶习，但是我们不应该丢失对市场体制基本特征的洞见。这就是基于劳动分工、专业化、创业和通过价格体系的社会协调，通过利用个体参与者的生产力以相互地促进其他参与者的消费目标，出奇有效的社会制度发生了作用。这意味着，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享受的生活标准也得到了提升，而该市场经济中的个体以不道德、或者令人厌恶的方式行事（而且，个体自身的参与也促进了那些不道德和令人讨厌之人的目标）。当我们绘制“经济和谐”的诱人图景时，即每个人都在“帮助”别人，使自己对其有用，我们不知不觉地允许“帮助”的思想悄悄地渗入道德或者情感的联系，这些是严格禁止的。我们忘记了，帮助可能无偏见地引申为“破坏性的和有害的或者是建设性的和有益的结果...”于是，私人的恶习可能会毫无疑问的产生公共利益。我们为市场经济所呼吁的道德中立性，不保证市场参与者从其参与中得到的利益不是由他人道德败坏的行为中间接产生的。道德中立仅仅意味着，道德败坏的行为对于市场经济的成功不是必要的。

我们可以对伦理和道德表示严重的关切，同时，我们可以支持和参与资本主义经济，且不放弃我们的道德承诺。这样行事确实不能让我们免于谴责并拒绝我们在自由市场（正如其他市场一样）社会中不断遭遇的道德败坏行为、贪婪、腐败和欺骗的责任。但是，在我们并不因此而自动支持的贪婪、腐败、堕落或欺骗的定罪中，我们可以提供此类支持和并为此类参与提供法律依据。贪婪、腐败、堕落和欺骗不是一个正常运作的繁荣的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

通过仔细鉴别理论中的市场经济的形式和现实世界中构成市场经济的实质，经济学家可以帮助防止对市场中不道德行为作用的误解。在形式层面上，不应该有误解。在这一层面上，没有必要按照误导性的总体物质财富或者纯货币收入的词汇来衡量一个社会的成功。在这一层面上，由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类构成的世界里，这一突兀的现实不需要欺骗我们，让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即市场协调的驱动力由我们的道德缺陷推波助澜。

随着对资本主义成功的秘诀清楚的理解，包括其参与者的人类意志（和该意志激发创业警觉性而导致相互发现和协调的能力），我们可以试图改善资本主义，而不影响其福祉，如果我们想要像道家一样做。我们可以采取道德（和说教）智慧可以识别的任何行为，去为了全面提升自己和我们的类同胞 – 而不干扰微妙和神奇的自发社会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素未蒙面或于对方闻

所未闻的人们，和几乎没有认识到即使是在想象中也并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或者需求的人们，于处处相互支持着对方，并且增加每个他人目标的实现。”

我的请求是，经济学家应该设法向整个世界呈现我们的科学，以通过强调抽象纯理论，阻止对自由市场过程中的伦理问题的灾难性误解，这在混乱地思考整个复杂的现实太过频繁地出现了。